

新文化运动中“礼教吃人”主题的建构过程与辩证解读

李心溪

上海政法学院, 上海 201701

摘要: 新文化运动时期, 启蒙先驱们希望借助民主、科学等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改造, 他们将中国传统文化视作封建制度迫害人民的主要原因, 并以“礼教吃人”为题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 意图彻底改造国民性, 但这种非理性的批判也造成了中国国民对传统文化中精髓部分的长期误解。本文将分析“礼教吃人”的建构过程, 对其进行辩证解读, 并从习近平文化思想出发分析其对现代中国传统文化观的影响和启示和在新时代大背景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应当采取的态度及措施。

关键词: 新文化运动; 礼教吃人; 习近平文化思想; 马克思主义

DOI: 10.63887/jc.2025.1.4.8

“礼教吃人”主题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先进知识分子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体系深刻反思后的产物, 源于对封建礼教束缚人性、压抑个性的批判。然而, 这一主题的建构并非没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它过于简化了传统礼教的复杂性, 忽视了其在维护社会稳定、传承文化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1], 还有一些观点认为它容易被过度解读, 成为一种激进的反传统情绪的表现, 从而导致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2]。在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语境中, “礼教吃人”的主题既揭示了传统文化中存在的问题, 也为新文化的建设提供了动力, 同时启示我们在对待传统文化时, 应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 既要看到其不足之处, 也要认识到其价值所在, 从而更好地推动文化的发展和进步。

1 新文化运动中“礼教吃人”主题的建构过程

辛亥革命前后, 康有为、袁世凯等人假托儒家礼教意图掀起复辟闹剧, 致使在新文化运动中“礼教”与封建、愚昧、落后等词深深联系在一起, 部分知识分子更是对“尊孔”思想与礼教思想深恶痛绝, 因此“礼教吃人”主题一经提出, 便迅速传播开来, 成为新文化运动中“道德革命”的口号之一。

1.1 “礼教吃人”主题的起源——新旧文化派的论战

1917年11月,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 这为五四时期的学者们提供了一个革命的样本, 使他们反思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 并渴望举行一场彻底的革命, 来彻底的打倒封建礼教, 开启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新纪元”这与试图通过维持旧秩序谋求发展的就文化派产生了冲突, 于是新旧文化派的论战便拉开了序幕。

1918年3月, 钱玄同化名王敬轩, 撰写了《给〈新青年〉编辑部的一封信》, 信中以守旧派的口吻罗列了种种诋毁新文化运动, 攻击《新青年》报刊的言论。刘半农则代表《新青年》, 回复了《复王敬轩书》, 信中提及文化保守派学者林纾, 嘲讽其小说毫无文学意味; 1918年5月, 作为新旧文化派论战的一环, 《狂人日记》的发刊首次将“礼教”与“吃人”联系在一起; 1919年, 林纾在《新申报》发表小说《荆生》和《妖梦》, 文中不乏表达对新文化运动无可奈何、只好想象自己身为“伟丈夫”以击溃新文化派的语句。在新旧文化派的不断论战中, “礼教吃人”主题逐渐成型, 《狂人日记》一书更是以白话文小说的形式让此主题深入人心。

1.2 “礼教吃人”的出处——《狂人日记》

《狂人日记》中的“吃人”有两层含义, 一是指现实中发生过的吃人肉事件如“易子而食”、“易牙烹子”、“割股疗亲”等, 另一层面则是以现实中的吃人肉事件间接指出封建礼教制度迫害人的思想和精

神的本质，展现出反动统治阶级残害被统治者的事实^[3]。当然，还有学者站在儒家仁义礼教的角度解读“礼教吃人”这一主题，认为新文化运动中学者批判的是用礼教做遮羞布掩盖腐败风俗的行为，而并非是抨击真正的礼教，认为“礼教吃人”主题说是以“恶俗”来替代礼教，并反过来批判传统礼教的一种激进的文学表达^[4]。这种思想正是鲁迅思想中最有生命力的表现，鲁迅认为进化是为了使广大人民从封建压迫，封建奴役中解放出来，同时也是为了使弱小民族从异族压迫、异族奴役中解放出来。所以鲁迅认为进化的另一个要义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反对封建王朝的复辟，和反对白人的种族歧视。而从进化论中“退化”的维度来看，鲁迅精锐的捕捉到了封建精神的奴役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危机，这使他迫切的加入到反封建主义斗争的大军中去，用“吃人”来抨击国民之中普遍存在的、受封建思想影响而形成的国民劣根性。

在一些吃人肉事件中，加害者与受害者之分还是相对明显的，但当“吃人”一词上升到传统社会秩序层面，这种区分就不那么明显了，即受害者也可能是加害者，书中的狂人也感叹自己未必不吃过自己妹子的肉，现在又轮到了自己，他自省“拥有四千年吃人履历”，即使狂人主观上不愿意“吃人”，但也必须去遵循“吃人”的传统社会秩序。《狂人日记》借狂热之口揭开了旧文化中以“仁义道德”为遮羞布的“吃人”传统和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每个人有“吃人”思想，或有意或无意的充当着“吃人者”，在一些特定条件下，“吃人者”与“被吃者”的身份角色也会相互转换。鲁迅对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的深刻把握让他笔下的狂人得出了“我也是人，所以他们想要吃我了”、“吃人”一事从来就是如此的定论，认为在礼教思想的桎梏下，在这样的传统社会秩序的规定下，中国民族的国民性愈加受到毒害而堕落。

鲁迅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他在洋务运动的失败和辛亥革命后混乱的政治局面中认识到了培育“新式国民”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在不打破旧思想体系的前提下，只在经济层面下功夫是无法实现社

会进步的。鲁迅认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极其缺乏个性，都是通过消减人的主体性和个性需求以达到通向“孔圣人”所描绘的理想王国的目的的，这与近代倡导的独立人格和个性解放相对立，使他得出了儒家礼教思想下培养出来的国民是“奴隶”而非“公民”的结论。鲁迅看不到传统文化理念塑造的积极国民形象，认为“仁者爱人”等儒家精华思想也不过只是上位者的美好愿景罢了，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方面早就背其消极方面所掩盖了。《狂人日记》就是鲁迅对中国人国民性弱点批判的经典之作，不仅是要批判“吃人”的礼教，更是要控诉中国国民甘于被封建统治阶级俘虏，自相残杀、同类相食。鲁迅希望通过激烈的文字语言来唤醒国民，揭露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带来的弊害，并通过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创造新文化。“礼教吃人”主题正是处于民族危亡和社会危机深重的情况下出现的矫枉过正的理念。

1.3 “礼教吃人”口号打响者——吴虞

吴虞在历史上的评价较为割裂，一方面，他身逢新文化运动盛时，为新文化运动呐喊助威，有着进步的形象；但另一方面，在生活中他又是一位相当封建的大家长，不仅拒绝供女儿读书，还在晚年纳妾狎妓。故而有学者评价他“只是躬逢新文化革命盛时，自己并没有多少才学”、“只是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而不可说是启蒙者”^[5]。因此，当“礼教吃人”这一话题被吴虞从《狂人日记》中挖掘出来后，他对此主题的批判便迅速的展开了。

吴虞认为，在孝悌二字的治理下，中国人对君父之权的崇拜容易被封建统治者利用，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但这样的行为逐渐发展成一味要求人子人臣行忠孝之事，而绝口不提对君父的要求，故而这样不平等的道德标准，会使宗法社会牵制军国社会的发展。吴虞的批判虽然激烈，但存在一定的逻辑矛盾。例如已经认识到了“吃人与礼教，本来是极相矛盾的事”，却仍将历史中的种种“吃人”事件归因于礼教之上。吴虞在文中举出的例证，如“醢彭越”、“杯羹之让”等，都是在抨击打着礼教幌子却行压迫、极权统治之事的上位者，却用其论证“礼教”与“吃人”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由此可见，应当对“礼教吃

人”主题进行辩证解读，不可歪曲“礼教”之意和盲目扩大批判的范围。

2 “礼教吃人”主题的内在矛盾的解读

“礼教吃人”主题所蕴含的内在矛盾是新文化派对于“礼教”的定义混乱，用陋俗文化、封建统治者篡改后的礼教思想代替原始儒教中“礼教”礼仪教化的概念，具体表现在：部分知识分子武断的将礼教定义为清末愈演愈烈的陋俗文化，忽略了原始儒学礼教的教化作用，希望以西方文化为媒介迅速实现道德的整体“嫁接”，故而以“吃人”形容礼教。尽管这体现了历史的必然要求，但过于激进，使文化变迁的速度紊乱，导致非理性的激荡与混乱。

2.1 “礼教吃人”主题内在矛盾产生的原因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体系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隋唐以后，经朱熹等人改造，儒学成为了理学（即新儒学）的主干，又因以先验的“天理”为世界本源，新儒学具有宗教色彩，同时也是精致的道德法则和家庭伦理体系规范。此时的儒家思想体系既集中了与近代中国现代化相悖的文化因素，同时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所谓与近代中国现代化相悖的文化因素，是指部分文化从通过礼仪教化使人对其本质的主动塑造变质为通过外力的强行的去规范、塑造人的内在属性，集中反映在婚姻文化、妇女文化上，如节烈观、贞操观等，也可称为陋俗文化。尤其在晚清，忠孝节义更是从原先温情的伦理关系成为要求盲目服从的政治伦理，成为极权政治、反人道的代表。1917年，袁世凯、张勋借孔教运动行复辟之事，使礼教被新文化派视为中国社会停滞与混乱的核心，因此新文化派将彻底打败“封建礼教”作为革命的必经过程之一。

新文化运动者们将“礼教吃人”这一历史上和政治上的偶然事件视作传统文化的必然性，将中国的一切问题归为孔子的做法是只纠结于现象背后的“本体”、将现实问题变为传统问题、将制度问题变为文化问题的体现。因此“礼教吃人”主题是忽略了具体事件在历史发展中的偶然性和复杂性的产物，放在五四时期对救亡图存的特殊时代下，更是增添了几分激

进的意味。由于复辟运动提倡尊孔读经，就要彻底打倒礼教，这种非学理且情绪化的模式不仅导致了反传统的盲目性，更是导致了“礼教吃人”此类反旧道德、旧文化的口号更像是因崇拜形成的一种工具，与其价值理性相分离。

2.2 对“礼教吃人”主题内涵的辩证

对于挂着孔丘“仁义道德”的招牌的“吃人者”，我们不得不将其与真正意义上的“仁义道德”相分离，不能因为某些恶俗受被封建统治者篡改的礼教的影响而去批判真正的礼教，尤其是真正的礼教中的“仁义礼智信”、“恭俭庄敬”等，反而是应该宣扬的。如果不辩证分析礼教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采取“一刀切”等激进做法，不仅会丢失礼教思想中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还会带来“文化危机”，使中国人民丧失对祖国的认同感。因此不若以真正的礼教结合科学来进行教化，通过科学、辩证分析等方法，在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精髓的同时摒弃阻碍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糟粕思想，来达到社会进步的目的。

3 对“礼教吃人”主题的辩证分析

3.1 对现代中国传统文化观的影响

从整体来看，新文化运动前期都是采取“反孔批儒”的方法来塑造新文化的，这种做法实际上也是被当时的时代具体观念所局限的，并未做到反思过去、超越当下、思虑未来，这使得在新文化运动中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变得激进，并未在对旧事物“扬弃”的条件下产生新事物。“礼教吃人”主题的提出就是因为过多的偏向于批判文化糟粕对中国近代造成的负面影响，而没有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进行科学理性的宣传，导致许多文化精粹也遭到批判，这对中华民族在精神文化领域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阻碍。“礼教吃人”主题在新文化运动中愈演愈烈，导致不仅只有糟粕受到了批判和舍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也开始国民误解，甚至抛弃，中华民族发展了五千年的文化根基的核心思想体系逐渐瓦解。自此之后，中国国民的主流价值观信仰和精神支撑也慢慢崩塌，间接导致了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丧失，在西方现代化思潮、

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抉择不定，在精神文化领域也没有形成真正凝聚全体人民的核心思想和观念。

不可否认，新文化运动在为新中国贡献适合时代进步的新文化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方面将感性的思考置于理性思考之上，“礼教吃人”主题就属于对传统文化的非理性批判，这种批判缺乏对激进情感和时代局限性的把握，对之后的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建设以及现代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观都产生了较为严重的消极影响。

3.2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应当采取的态度及措施

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结合习近平文化思想，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要应对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诸如“礼教吃人”主题形成的对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首先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指导思想，使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解决和分析问题。就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要唯物的、辩证的分析传统文化，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理清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及其与各个历史阶段中的国情所适应的情况。

其次，要在坚持学习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这表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发挥着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因此，在大力推动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今天，我们仍然应该秉持谦逊的态度学习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

最后，还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新文化运动中的传统文化与新文化之

争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传统文化的现代适用性问题。在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要发展先进文化，就不能够闭门造车，而是应该以博大的胸襟吸收、借鉴世界各地的优秀文化，在立足于本国实际的前提下汲取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使中国传统文化面向世界、影响世界。此外，还要以开放的视野采取多种形式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国民族伟大复兴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结语

新文化运动有力地打击和动摇了长期以来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唤醒了一代青年，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一股生气勃勃的思想解放的潮流。但这一时期“礼教吃人”主题实际上是非理性批判的产物，这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息息相关，它极大程度迎合了当时要求文化进步的呼声，也创造出了许多符合时代发展文化因素。但部分知识分子没有辩证唯物的分析传统文化的本质，只一味的批判传统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忽略了学习和传承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导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断被抛弃和误解，使中国人民缺乏文化自信，跃进式的“以新代旧”既不具有科学性，也不具有现实性。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扬弃”的方法辩证取舍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并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世界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才是文化强国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 [1] 杨红军.《狂人日记》：“礼教吃人”主题的建构过程与反思[J]. 鲁迅研究月刊, 2017, (05): 27-36.
- [2] 徐仲佳. “立人”与“吃人”的异质——论鲁迅传统与传统文化之关系[J]. 东岳论丛, 2022, 43(12): 40-47.
- [3] 金欣. 变革社会中的法律与人：吴虞家事争讼[J]. 法律史评论, 2023, 20(01): 275-286.
- [4] 卓腮娇. 论中国陋俗文化更迭与精神进化中的理性诉求[J]. 农业考古, 2008, (06): 226-229.
- [5]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55-156页。

作者简介：李心溪，女，上海市，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邮寄地址：上海市松江区外青松公路7989号上海政法学院，手机号13764922931，收件人：李心溪。